

副刊內容傳統與新聞理論的解釋能力

潘 家 慶*

摘要

透過文獻研究及內容分析，本研究發現報紙副刊內容，有四項重要傳統，即內容隨時代而有不同導向；儘管內容時有變革，然仍以文學文藝為主要內容；副刊第二項受到重視內容，即評論性文字與消息；副刊風格之建立，主編是一個重要因素。

我們用新聞學理論來解讀這四個傳統，發現解釋力頗強，建議能力也頗值重視。九項新聞學理，包括政經影響、文化霸權、使用與滿足、社會期待、議題設定、沉默螺旋、知識差距、守門人、以及新事物擴散理論等，對於副刊理論的建構，皆有一定的貢獻。

壹、前 言

副刊在整個世界報業體系中，可說是極其獨特的傳統。從第一家中文報紙 North China Daily News 中文版《字林滙報》的附張「消閒報」開始，他就充塞了中國人的憧憬，不論是消閒的、文學的、文化的，或是綜合的內容，都代表了文人一個夢。這和西方一開始報紙出自印刷匠(printer)之手，後來成為一種商品，大異其趣。

從 1897 年第一個副刊到今年 1997，副刊歷經了百年歷史，他在各個報館中的地位、角

* 作者為本校新聞學系教授。

** 本文初稿曾於民國八十六年元月十日「世界中文報紙副刊學術研討會」宣讀。

*** 本文完成，感謝廣電系助教郭乃華協助搜集資料，編校打字。

色因人而異。直到今天台灣報紙，無論如何，都少不了一個以上的副刊，但因為報老闆的觀念、副刊編輯素養與識見、讀者的喜好程度、與報紙本身對副刊的投資，都是雲泥之間，各有酸甜苦辣，真所謂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然就新聞學界而言，報紙副刊其實不「副」，甚至是報紙的四大結構（新聞、評論、副刊、廣告）之一，不可或缺。

就歷次台灣民眾傳播行為調查研究來看，（徐佳士等，1975:68）（潘家慶等，1986:57）（潘家慶等，1995:74），人們對副刊的偏愛程度總在前五名，喜好副刊的讀者總在百分之十三左右。（見表 1-1）這雖不是一個可觀的成績，卻是一個不容忽略的數字。很可惜，針對副刊閱讀需求，沒有專門的調查數據。也許正面來看，看不出他的重要性，如果問題是，「一個沒有副刊的報紙像不像一份報紙？」「如果沒有副刊，你是否願意訂閱或購買？」「沒有副刊的報紙，你能忍耐他到多久？」「看到平日副刊突然消失了，你的第一個反應是什麼？」「副刊沒有了，他對讀者、對社會的衝擊是什麼？」由這些問題，也許我們從答案中可以看出副刊的真義。

表 1-1 傳播行為調查中的副刊

	1974	1986	1993
喜好的讀者	13.2%	13.9%	14.2%
排序	4	2	5

研究副刊的學問能否獨樹一幟，卓然而立，一方面要看它本身的發展與社會的關係，另一方面要看研究副刊學者努力的程度。如何提昇內涵的系統性，這也許就是若干學者所倡議的「副刊學」（向陽，民 82:557-596）的主要理由。

副刊學，實際上尚未成形，然就報紙這層意義來看，副刊毫無異議地，他是報學的重要內涵之一。因此，一切報學理論、新聞媒介理論、傳播理論都可用來解釋副刊的運作與定位。

本研究即以副刊所表現出來的若干傳統，用新聞學理加以檢視，一則以證明「副刊」這個題目的學術性格，二則說明新聞學理對副刊內容的解釋能力。所謂理論，通俗說來，他是

一種解釋能力，一種規範典則，既是一種預測能力，也是一種控制表徵。有此四者，副刊的學術性格自然形成，副刊學有沒有必要加以建構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副刊是報業中的一個分支體系，他其實就是新聞學的一部份。

本文所談副刊乃以「××副刊」為名的主要副刊，至於其他如家庭婦女、兒童、醫藥保健、讀書、山水旅遊、資訊等，若干報紙已有「專刊組」管轄，不在本文討論之列。

貳、副刊是政經情勢的反照

副刊行走了五十年後，已在中國報業中樹立了不可動搖的地位。至本世紀五十年代，中國報業截然分成兩支，一派師法馬列，奉行黨報制度，副刊必須與報紙方向一致，「同樣應該宣傳馬克思主義和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和方針、政策，動員和組織人民群眾，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而奮鬥。」（鄭興東等，1988:365），另一支則為撤退來台與台灣本地合流的，名為自由報業，骨子裡則為國家統治型的報業體制。

大陸報紙副刊，在此暫且不表。就五十年代開始的台灣報業，形成了兩個傳統：一個是宏觀上來看，隨著政經情勢變化，報業體制的改變，不同時期有不同報業面貌、不同的副刊內容導向；另一個是從微觀上來看，不論時代變遷如何，副刊內容大體固定在五、六種類型之中，不知是否為了遠離政治，副刊內容一般多偏向以文學創作為主流。

一、政經影響下副刊內容的變遷

先從宏觀角度看，副刊從報史與社會變遷的互動歷程中，離不開政經影響，也反映出知識份子的文化關懷與困境：（許瑩月，民 81）

1.本世紀五十年代，政府撤退來台，整個社會意識形態是反共抗俄；政治是絕對威權統治；經濟是土地改革後農業型態；而社會遵循儒家倫理。報業在這十年可以說由重建到緊縮，原來由大陸撤退來台的新聞事業與本地新聞事業合流，至民國 46 年，報禁政策正式開始，限張（二大張）政策縮小了報紙內容的空間，副刊直接受到了衝擊。篇幅不多之外，隨時可能面臨廣告侵越副刊的無奈。

由於篇幅不多，副刊所登文字多短且雜，主要內容：(1)懷念故土風光，(2)控訴共黨罪行，(3)日本及歐美的作品譯介。有人稱這個時期是「回憶的文學」，主要是「反共文藝」與「大兵文學」（許瑩月，民 81:87）。其實我們知道報人的心目中可能並不這麼想，他們刻意希望跟意識形態分開。若干副刊編者經營下，現代詩出現在五十年代中期副刊上；五十年代後期，以「聯副」為例，也是一個短篇小說豐收的季節。（林海音，民 71:288）後來「聯副」主編亞弦曾有一段話，可作證明，他說：「我熱愛文藝與寫作，也是吃文藝副刊奶水成長的，傳統副刊形象早在心中根深蒂固，我對他眷戀的情感，又豈僅是懷舊？」（亞弦，民 69:13）。

2.六十年代對台灣來說，是經濟轉型的十年，民國 52 年起，工業生產總值首次超過農業生產總值，貿易也由「進口替代」轉為「出口導向」，美援於民國 54 年停止。意識形態仍然延續了反共抗俄，變成了反共復國；文化上，民國 57 年，政府宣佈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政治上依然威權統治，媒介中李敖文章，激起一陣中西文化論戰，相對地也隱隱孕育了對本土的關懷。

這十年中，報禁仍在，報紙家數未變（31 家），報紙則因國民購買力大增，報紙銷路由 56 萬份倍增為 125 萬份。（任熙雍，民 60:52）民國 51 年，首家商業電視台（台視）開播。民國 56 年，幾家大報將篇幅擴張為兩大張半。報紙副刊相對來說，有了較穩定的篇幅，新作家不斷出現。連載的歷史小說、浪漫愛情小說、新聞故事圖片，大量擁入副刊，此外許多論述性文字，環繞著諸如中文系課程、國畫，乃至中國科學史，副刊開始文化性、社會性的多元轉向。有人說，這是向「苦悶的年代做麻醉似的逃避」（許瑩月，民 1:95），是真是假，當時的副刊編輯們可作個證言。

3.時序進入七十年代經濟繼續發展，雖然有民國 63 年能源危機，政府仍然開始推動現代化的十項建設。政治上紛擾日增，民國 60 年退出聯合國，民國 61 年尼克森訪問中共，民國 64 年老總統過世，民國 61 年及 64 年兩次分別補選立委，民國 67 年蔣經國繼任總統，民國 66 年中壢事件，及民國 68 年美麗島事件，也使黨外勢力興起。意識形態上反共復國聲音漸趨冷卻；社會文化上由於政治上挫敗頻頻，以及西化與本土意識第二次論辯，衍生了「台灣意識」。

跟著經濟發展與義務教育延長的果實，報業在七十年代可以說突飛猛進，報紙總銷路再

度成為 350 萬份，成長率為 2.7 倍，平均每五人有一份報紙，廣告總值超過 44 億，兩大報逐漸形成報團，同時報紙開始電腦化的進程。（漆敬堯，民 70:49-52）此時報紙已增至三大張，加上「縮字」、「換版」、「分版」，報紙經營策略層出不窮地變化。

報紙副刊逐漸由文藝的副刊轉向成社會的、文化的、綜合的副刊。六十年代流行的現代主義，遭到在政治挫敗中興起的本土意識的批判。民國 66 年，繼「現代詩」論戰後，展開了「鄉土文學論戰」，使原來的中西文化論戰之外，又加入了「中原文化」與「台灣文化」的對辯。其實與其說是中原與台灣之爭，不如說是省籍地域認同之爭。到了七十年代，本省籍知識份子、作家、藝術家，不但領悟到自己的出身，更懂得如何表達他們的認同，所以在民國 68 年五四，「聯副」與「人間」各以專輯形式大肆紀念時，「自立」則製作了「鹽份地帶文學展」，介紹台灣文學，表達台灣意識，所謂「尋根的年代」，意即在此。

4. 八十年代被稱之為鬆綁的年代，政治上，一元式的威權統治，隨著民國 77 年蔣經國逝世，正式解體。民國 75 年，民進黨成立；民國 76 年 7 月 15 日解嚴；同年 11 月 1 日開放大陸探親，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成了這時的政治口號。經濟上的發展，雖然被譽之為奇蹟，但經濟發展所遺留下來的負面效果，逐一浮上檯面。社會文化上，中國結與台灣結，依然對峙，社會力勃興，使不同的社會運動一一湧現，如消費者運動、原住民權利、環保抗爭、反核等等。

報業在經濟繁榮的背景下成長，八十年代又加入了民主因素，使媒介發展如虎添翼。民國 76 年政府考慮解除報禁，民國 77 正式開放新報登記與報紙增張，報紙發行量八十年代開始即快速竄升至 350 萬份，至民國 79 年估計已達 450 萬份。（賴光臨，民 80:64）。

副刊在此時期逐漸多樣化，各報副刊不再只有一種，少則兩、三種，多則六、七種。在報社組織中，為與原先副刊區別，有些報紙成立了專刊組，來統領不同副刊。原有副刊內容也逐漸多元而社會化、新聞化。誠如賴光臨所述，副刊在此時期，一方面作為腹地，支援相關單位，如諾貝爾獎金消息的衍申，與新聞版面遙遙呼應；另一方面作前鋒，處理新聞版面不便處理的材料，如大陸探親文章先行出現。（賴光臨，民 80:69）代表這種先鋒性格的副刊材料，如民國 73 年「人間」發表龍應台的「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民國 76 年「聯副」刊出的「一個中國人的想法」；民國 77 年「人間」推出一系列大陸電視劇「河殤」討論文字，其實這也凸現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此時期明白的對抗。

5.九十年代雖方過六年，毫無疑問，政治上的威權統治一去不復返，代之而起的是自由、民主。李登輝一次是舊式民主下的總統（1990），一次是新式民主下直選總統。國民黨變了，新黨從國民黨出走，有人說國民黨愈來愈接近民進黨，最重要的大陸政策開始模糊化。經濟開始走下坡，使政府不得不提出亞太營運中心計畫。社會上弱勢族群爭取自我權力與文化認同力轉強。

報紙隨著經濟不景氣，各項發展陳下滑的態勢，由於電子媒介政策的鬆綁，有線電視法（1993）實行後，廣播頻道開放，以及第四家無線電視台的核准，報紙的閱讀率逐漸下降，國人閱報時間持續減少，（楊仁烽，民85:2）復由於白報紙的漲價，報紙在近三年形成了三十年來飛躍過程中的盤整期，未來情況如何，沒有人可以預料。

副刊沿著八十年代的腳步，有的刻意強調本土化，有的繼續文化性、綜合性，有的則仍然堅持文藝性副刊。由於有線電視及廣播頻道大量湧出，有人擔心看報紙的人愈來愈少，對副刊關注相對也會不斷減少，有人擔憂從各報組織、人事、軟硬體社備上，證明報紙經營者不再以副刊為他們經營、投資的主要對象；也許再過四、五年，我們可以得到明證。

二、政經影響與文化霸權

由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粗略印象是：政治經濟體制→媒介制度與媒介環境→報紙副刊內容的變化，這樣一個次第影響的序列，不僅在世界報業發展過程中是一項事實，而且在台灣這個境域，也完全符合這項理論。換句話說，一國政經情勢，直接影響了媒介制度與內容。

這個理論在新聞學理中，常常被提到，但卻從不曾像其他新聞理論那樣被具體的指出、假設、求證、或發現。他屬於一種總體說法，卻在每一個社會中常常被印證。十八世紀以前，正統派哲學家，從柏拉圖、馬志維尼到黑格爾，強調一切「人生而為國家」，於是有了國家統治的報業體制。在英國因而有皇家特許制度、報業津貼制度、知識稅，以及定義浮泛的煽動罪與誹謗罪。到了米爾頓、洛克與米勒的自由論點大興，「國家為個人而存在」理論倡行，民主主義、資本主義帶來了自由放任的報業體制。從英國開始有了報業經營自由、言論自由、國會採訪自由與出版自由。其影響報業內容之鉅，不在話下。也正由於有馬克思、恩格斯、

列寧等人的「報紙是一定社會經濟基礎的反映」，「社會體系（政治、經濟）決定了大眾媒介制度」，（鄭瑞城，民 77:10）於是有了共產國家的黨報體制。

總之，誠如馬奎爾(D.McQuail,1994:2)所說：「媒介深深依賴著一國政治、經濟力量所組構的那樣體制」，我們從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台灣政經情勢變化，所影響的媒介體制，和他的內容，得到明證。

其次，由於政經情勢主導了媒介體制與媒介內容，毫無疑問，政治上的意識形態，配合經濟制度上的氛圍，久而久之形成一種文化霸權——五十年代強烈的「大中國意識」與隱含的「西化意識」——彌漫在整個社會，作為社會指標的報業，尤其明顯。

文化霸權與媒介霸權主要起源於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主要概念來自葛蘭西(A. Gramsci)，他指的是一個階級如何透過政治及意識形態結合的力量，來統領另一個階級。葛蘭西將上層結構分為「公民社會」與「政治社會」兩種。公民社會以說服為基本因素，後者則以武力控制為主。公民社會就理念來說，它包括了宗教、哲學、法律、經濟、科學、文化、藝術等；就制度層面言，它包括了教會、學校、傳播媒介等。公民社會發展過程中，資產階級必然設法建立一套有利於自己統治的社會價值體系，鼓吹到每一角落，成為多數人都接受的社會價值與道德。當社會普遍接受這個價值觀時，統治者便可維持其霸權，經由知識份子代勞，使其繼續為社會所接受，最終能維持統治階級的合法霸權。採用霸權論者相信，意識形態乃一種象徵的機制(symbolic mechanism)，透過此一機制，可使社會各部份整合。

在這中間，知識份子——我們這兒包括副刊主編、副刊的作者與讀者，作為過程中的核心，他既可塑造統治文化，藉以維護政治現狀；又可塑造新普羅文化，以打破政治現狀，（陳秉璋、陳信木，民 77:230）形成對立，削弱對方。

這段所謂霸權(hegemony)概念，正足以解釋五十年來副刊作為社會鼓手，如何協助政治、經濟勢力形成他的政治、文化與媒介霸權，以強化政治社會化。到了八十年代，情況完全不同了，另一類知識份子（鄉土文學主張者）群起建立他們自己的文化園地，於是有所謂的台灣意識與中國意識的對立，而今甚至有新文化霸權的出現。其實這種霸權不斷分化對立，如城市對鄉村、A 族群對 B 族群、中心對邊陲、市區對郊區等，不斷在社會中崛起、整合、對抗、轉變、乃至削弱，以至於消失。

參、副刊以文藝內容為主流

一、副刊內容的分類

民國 63 年，筆者曾對「報紙副刊的功能」，作了一次內容分析，（潘家慶，民 64:185-212）發現自民國 42 年到民國 61 年二十年中，以《聯合報》及《中央日報》為例，副刊內容大都落在文藝、趣味、新聞評述、新知、人物修養等五大類別，其中又以文藝居於主流地位，「中副」的文藝內容佔 43.7%，而「聯副」則佔 58.5%。（見表 3-1）這五個類別，依當時樣本閱讀所得，大致各有內涵：

表 3-1 中央、聯合兩報副刊內容總量分析（民國 42 年 -61 年）

	中央日報			聯合報		
	平方吋	百分比	排序	平方吋	百分比	排序
趣 味	714.9	20.4	2	445.9	14.0	3
文 藝	1539.2	43.7	1	1855.2	58.5	1
人物修養	528.3	15.0	3	450.6	14.2	2
新 知	503.9	14.3	4	266.6	8.5	4
新聞評述	235.1	6.6	5	153.3	4.8	5
總 計	3521.4	100.0		3171.6	100.0	

- 1.文藝：包括各種文學理論、藝術創作、歷史小說、現代小說、古典詩詞、新詩、散文、小品文、國內外文壇動態、文學批評、章回小說、漫畫、影評等。
- 2.趣味：所有足以引起一般人心情歡愉的作品，包括幽默小品、故事敘述、風土人情、歷史掌故、軼事、山水、遊記等。
- 3.新聞、評述：副刊中有許多專欄作家、或方塊作家，他們用不同於新聞版面的筆法與

內容，評論時事、或社會問題。除表達個人的思想、觀點、意見外，更多是解釋、述評、介紹。

4.新知：包括新知介紹、新觀念啟發，前者包括醫藥衛生、科學發明、發現，後者指一種新思想、新態度、新方法的傳播。

5.人物修養：包括人物介紹、作人處世方法，及一般道德價值的衡量。還有修心養性的功夫、生活感懷、交友經驗等。

可惜的是七十年代以來，國內殊少這類研究。缺少這類研究，就缺少實證資料以說明八十年代，乃至九十年代報紙內容的變化。為了補救這個缺失，筆者在接受論文邀請後，立即從民國 85 年 10 月 15 日至 11 月 15 日一個月時間，對國內四大報，進行一個月的連續性統計。受檢的報紙，包括執政黨的《中央日報》，兩家民營報紙《聯合報》、《中國時報》，以及異軍突起，自稱代表本土的《自由時報》。

由於時間與人力所限，四報內容未用面積測量，僅以各項類別出現頻率統計之。（見表 3-2）類別的名稱，我們仍以民國 63 年研究的五項類別為本，以便比較，結果發現：

1.四報仍以文藝為最多內容，由於未計面積，單以則數，看不出他的數量驚人。

2.第二個主要內容為新聞評述，也正因為沒有統計面積，在則數上雖有接近文藝的，因為一般可以推理，副刊新聞，評述多為簡要短文，乃至花絮式敘述，其數量顯然比不過文藝。

3.內容中「人物修養」與「新知」很少，特別是「新知」，有掛零的。主要原因是九十

表 3-2 台北四報副刊內容歸類統計（85/10/15-85/11/15）

	文藝	新聞評述	人物修養	新知	趣味
中央日報	113	54	29	8	14
聯合報	131	131	24	0	32
中國時報	183	101	28	1	16
自由時報	165	101	27	4	2

年代以後，報紙各類副刊逐漸專門化、多元化，以「新知」言，各報已有「醫藥」、「資訊」、「讀書」等類專刊。「人物修養」也分出去了，像《中央日報》的「長河」專刊、《聯合報》的「繽紛」專刊。

是以這個統計，雖說粗糙，但不無參考價值，因為主要輪廓早已浮現出來。正由於前後兩次統計，不管時代如何變遷，文藝或文學作品是副刊不變的主要內容，其他類別則因前後時代不同，特別是報紙增張，專刊逐漸增多。第一次統計時，其次為「趣味」較多，「人物修養」第三，第四才是「新聞評述」，第五為「新知」。這次統計，由於很多「趣味」、「人物」紛紛走入專刊，故第二為「新聞評述」，第三是「人物修養」，第四「趣味」，第五是「新知」。

副刊所以到今天仍然以文藝、文學稿件為主流，金恆煒的說法可作重要參考，他說：「我們堅信幾十年後，評論、雜文留下的可能不多，可是好小說、好散文卻能傳之久遠，是文學的主流，所以激勵小說與散文創作，是我們主要工作。」（金恆煒，民 74:123）這說明了何以報紙主要副刊，仍以文藝文學為徵稿的對象。

二、使用滿足、社會期待與知識差距

從閱聽人這個角度來看副刊，重視副刊閱讀的讀者，大半屬於知識份子或準知識份子。經常閱讀副刊的人在總人口結構中，依台灣地區民眾傳播行為的調查，他們的比率相當於 13-14%。不要小看這一小批人的心願，他們閱讀副刊的動機，從追求娛樂消閒，到尋求資訊與意見，再到文化傳承與創新。閱讀副刊、期待副刊，不啻有一種使命感。說得更白一點，他們常藉著對副刊的「使用」，尋求心靈上的「滿足」，一天不讀副刊，滿身覺得不自在。

於是我們在新聞理論上看到了使用與滿足理論 (uses and gratification theory)，跟社會期待理論 (social expectation theory)。

1979 年英國學者布魯勒(Blumler)揉合了哈佛大學心理學者鮑爾(Bauer)的「頑固閱聽人」說法，為主動閱聽人定下了四重義涵(Blumler, 1979)：1. 人們總是爭取有用的資訊；2. 人們使用媒介常受以往動機的牽引；3. 人們的嗜好與興趣常反映在媒介行為上；4. 人們的興趣與行為常常不輕易改變。這一說法，與以往閱聽人是「等著東西來填肚子」大異其趣，也進一

步說明閱聽人求取資訊，是有一些基本信念、態度、理想、或抱負作為基礎的。人們閱讀資訊，希望能使用它滿足自己，所以整個研究重點是「閱聽人能對媒介內容作什麼？」這便是我們前面所說，中國知識份子對報紙內容總有個夢。沉潛在這個夢中的，包括他們對資訊的興趣、對文化關懷、對社會重建的願望。使用與滿足理論，最可解釋知識份子這份使命感。

進一步來看，社會期待理論更能解釋，何以讀者對副刊這個版面充滿了興趣與期待。媒介內容，或說副刊內容刊載了當代社會生活中各群體規範、角色、等級和制約。讀者從中會感覺什麼樣行為會遭受譴責，什麼樣行為會獲得肯定。社會期待論可讓人覺得，副刊內容更容易產生社會化影響，也促使社會成員參與社會組織活動前，即明確他的社會期待，以及「期待」的來源。副刊對某一群體描述也許真實，也許不真實（如詩歌、小說，乃至散文）；不管這些描述與現實關係如何，讀者都會接受他們，使成社會期待的一個來源。(DeFluer & Rokeach, 1989:219-227)

這些論斷一一通過社會化進行學習，與通過社會組織發生人類活動，是我們探討副刊內容長期效果，不能忽視的兩個概念。

由於報紙內容結構改變，與整個媒介環境的變異（如有線電視的興起），有人擔心報紙的閱讀率會逐漸下降，其實我們更擔心是副刊消費化、專精化的結果，可能帶來知識差距(knowledge gap theory)的效應。這個效應的研究，開始於七〇年代初期，由美國學界的特欽那(Tichenor)等人所倡議。他們認為，當社會系統中資訊增加時，高社經地位的人獲得知識能力，大於低社經地位者。(Tichenor, Donohue and Olien, 1970:159-170)1976年，羅吉士將這個觀念擴大為傳播效果差距。(Rogers, 1976:9)

副刊一直比較接近知識份子，因為那些內容材料與他們關係密切，可是當副刊陳義過高，就難免曲高和寡，逐漸令人生厭。像連載數日，全版都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作品的翻譯與論述；××文學論戰的持續；學術化文章與討論會的連載，以及一些泛政治化的專題、翻案與消費文化資料，從某個觀點來看，都是讀者畏縮不前的主因。知識差距理論其實也提醒我們，如何可以縮短這種差距：社會結構異質性較高的社會，這種差距容易增加；印刷媒介遠比電子媒介的差距要大；資訊內容影響面廣、與社會衝突相關、與個人有密切關係的，差距比較小；閱聽人對議題關心程度，及事前了解程度高的，差距比較小。

以上所述，相信是副刊內容、走向最好的一個參考。

肆、新聞評述在副刊中的角色

一、新聞與評論在副刊上展開了視野

新聞評述雖說是報紙四大內容之一，但在新聞版面中的評論文字，引起讀者共鳴的作品，一般來說並不很多，這由一般人注意報紙的評論文字的頻率中可以看出。民國 75 年，一般人喜好社論、短評的只佔 3.7%，而喜歡讀專欄文字的僅佔 0.9%。（潘家慶等，1986:57）民國 82 年，一般人喜好社論、短評的，略有增加，為 7.7%，喜歡專欄文字的則升為 2.1%。（潘家慶等，1995:74）然而，另一項專對副刊的調查，為《文訊》月刊在民國 74 年 10 月對 550 位各行各業人士所作調查，結果有六成受訪人(61.5%)喜歡看副刊。喜歡看副刊的原因中，有 22.78% 的人，喜歡副刊中的專欄文字。如果從讀者趣味取向來考察，受訪人希望副刊多登報導文字的有 24.71%，希望多登社會批評文字的也佔 24.24%。（焦桐，1986:67-69）。

由此可見，副刊中的消息與評論文字，是閱讀副刊者所喜好的一種內容。證諸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報紙副刊中普遍重視「方塊文章」，方塊作家受人崇拜、受人歡迎（像如茵、何凡、方村、言曦、柏楊、吳心柳、彭歌、林語堂）不下於詩人、小說家、散文作家。因為他們處理社會問題、時事問題，可以不同於社論、短評、或專欄文字。因為是副刊，他們常以幽默、迂迴、或反諷的方式，解釋社會事件，指導社會大眾；敘述事件的來龍去脈，或提供更多資訊或說理，使文章可讀性大大增加。

另外，報導性的文字，除了七十年代後期興起的報導文學外，藝文簡短消息，如作家近況、文壇動態、新作發表、文藝獎評審經過、頒獎、文藝座談等等消息，也是讀者所喜歡的。

如前所述，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新聞評述，大多以方塊文章或短評為主流，至七十年代中期，也就是民國 66 年，兩路人馬展開「鄉土文學」論戰。民國 68 年五四運動，「聯副」與「人間」兩個副刊以專輯形式大肆紀念五四。另一方面，「自立副刊」則製作了「鹽分地帶文學展」專輯，介紹台灣文學，自此「自立」旗幟鮮明地大張本土文化的旗幟，作為「台灣意識」濃厚作家之園地。到了八十年代，評論文字更是走入新境，社會、文化評論隨著經

濟成長、社會逐漸開放，大放異彩。民國 73 年 11 月，龍應台在「人間」的「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民國 76 年 4 月丁邦新在「聯副」的「一個中國人的想法」，隨後引起的是何懷碩在「人間」的「另一個中國人的想法」，以及「自立副刊」洪惟仁的「入境隨俗，落地生根」。再即是民國 77 年 8 月因大陸電視劇「河殤」解說詞刊登在「人間」，又一次引起了「中西文化」論戰的辯論。

因此文藝的副刊，到了七十年代中期逐漸轉變成「文化的」、「新聞的」、「綜合的」、「社會的」副刊後，有人固然憂心忡忡（尹雪曼，民 81:83,77）（隱地，民 81:15），然從傳播大眾訊息與關懷社會文化，副刊的世界似乎是走得愈形寬廣了，說起來這並非壞事。畢竟文藝文學的發展，報紙有一定的使命，但並非全部的、唯一的使命。不論知識份子或一般民眾，他們固然有一定的比例比較偏愛文學，但有另外一部份人關懷文化、新聞、社會，有什麼不好呢？

二、議題設定與沉默螺旋

這時不禁使人想起，新聞理論中的議題設定理論(agenda setting)與沉默的螺旋(spiral of silence)理論。

議題設定理論開始於馬康姆與蕭(McCombs & Shaw, 1972)的研究，主要假設是說，媒介上的議題，經媒介反覆報導、評論，極可能成為社會議題。議題設定的相關條件，根據溫特(Winter, 1981)研究指出，包括了兩大類，即媒介的刺激因素，如議題性質、媒介報導時間的長短、議題事件的接近性、訊息來源可信度、媒介影響力；另一類即閱聽人的屬性，內容涵蓋使用媒介頻率，人際討論的情況，閱聽人對問題了解程度，與閱聽人的人口及人格因素。

儘管議題設定理論不是沒有爭議，如是閱聽人的興趣驅策，或是守門人主觀的選擇？畢竟理論肯定了媒介效果，且將問題定位在認知層面，副刊消息的內容——特別是評論議題的設定，就得費心思量，以協助讀者獲得資訊，為讀者解釋資訊，在公益的前題之下，讓讀者也參與議題的討論與建構，從而善盡媒介的社會責任。

不過，我們要記住，社會上常有許多真知灼見被忽視掉，其實也是少數人常常隱藏他們自己的意見，這就要由沉默的螺旋理論中一探究竟。

沉默螺旋理論創始人為德國民意學者諾爾紐曼(Noelle-Neumann,1974)(翁秀琪，民 81:195-214)，其主要論點包括：

- 1.人類行為重要動力，即不被孤立；
- 2.人對環境中意見分配有觀察能力；
- 3.因為害怕孤立，人們常附和強勢意見，對弱勢意見，常懼於表達；
- 4.因此，強勢意見愈來愈強，弱勢意見則反之；
- 5.人們常以為大眾媒介所表現，為多數人的想法；
- 6.人們樂於在媒介上討論「多數人的想法」；
- 7.媒介挾其傳播優勢，一般人對「選擇性認知功能」遭受很大阻力。
- 8.至此傳播者在民意形成過程中，佔有舉足輕重之角色。

由此，我們發現，副刊消息與評論議題的選擇，主編的責任固然很重，基於副刊的特性，編者如何發掘社會中的真知灼見，讓那些害怕孤立者不覺得孤立；讓少數人的意見得有刊佈的機會，實在是副刊的重要職責與角色。如果這些意見是一種真理，藉著副刊的討論，變成社會景從的主流理論，豈不是副刊主編的一大貢獻。

伍、副刊內容風格與主編的素養

一、副刊主編的角色

副刊內容能否形成一種風格，影響因素可以說是多元的，除了當時的「時代背景」，就是「報社」或是「報老闆」的支持程度，第三個因素，也是最重要的一個因素就是「副刊主編」。副刊主編與一般新聞編輯不同，一般新聞編輯所處理稿件，從記者手寫到新聞稿刊登出來，中間過程可以說層層關卡、層層選擇，有的稿件到了最後可能在質量上都有改變，有的稿件甚至中途就被刪了下來。副刊稿件多半有一個審稿標準，合於標準者，一律採用，因為很少考慮時效問題，合格稿件今天不用，明天用，明天不用後天用，因此副刊編輯，便是唯一的守關口的人。副刊發展方向，完全取決於主編之手。

副刊主編實際就是副刊風格的塑造者。民國初年，張東蓀創造了學術性副刊（「學燈」）、

孫伏園創造了文學性副刊（「晨報副鐫」）。特別是後者，對於五四時期新文學運動，極盡推波助瀾的作用。抗戰時期《大公報》的「文史周刊」最為有名，主編除了胡適之先生，執筆者都是當時學術界名流，研究文史者莫不捧讀再三。

由此可見，副刊主編決定了副刊的風格，而主編的素養與識見，成了副刊品質的保證。副刊的風格更常藉著主編個人的文藝觀、藝術觀、道德觀、人生觀，乃至於宇宙觀表現出來。細數台灣五十年來報紙副刊主編所形成的特殊風格，形式上大體與他們任職的時間有關。換言之，任職時間較久的，才能創造出一種特殊風範。依《文訊》在民國 75 年的統計，我們對若干報紙主編，大抵可得到一個粗略的印象，也就是任期較長的主編如下：（文訊編輯室，民 75:89-104）

中央日報：耿修業（12年）、孫如陵（21年）

中國時報：桑品載（5年）、高信彊（8年）

自立晚報：柏楊（8年）、司徒衛（13年）、向陽（5年）

聯合報：林海音（10年）、平鑫濤（13年）、亞弦（9年）

一位主編工作歷經五年以上，大抵可以創出一種典型、一種風尚。就我們所知，《中央日報》在耿修業、孫如陵兩人經營下，使中副綻放出一種莊重、嚴肅，卻不呆板的領袖群倫的氣質。《自立晚報》在向陽耕耘下，成為本土作家的重鎮。《聯合報》在林海音的努力下，留下了許多小說的佳作；在平鑫濤的經營下，又創造了多少古典與連載佳作；亞弦則把「聯副」帶入社會，使副刊成為多元化、社會化的文化副刊。《中國時報》的高信彊，為副刊帶來了革命性的貢獻，特別是「人間」與「聯副」競爭下，將中國報紙副刊帶上新路，擴大了副刊視野。每個主編正如每個個人，容有不同褒貶，但在副刊創作上，高信彊無疑是當時重要的旗手。這可從《文訊》21期所列副刊評論文字中看出，在「副刊主編」這類共 33 篇文章，而討論高信彊的文字，即高達 14 篇，比例達百分之四十二。（張錦郎，民 74:185）這種驚人的紀錄，足以說明高氏在報紙副刊經營中，受人重視的程度。

二、守門人與新事物擴散

副刊主編無疑是典型的守門人(gatekeeper)，他甚至比報社內其他編輯記者，具有更多的

獨特能力，主導自己版面的方向。新聞理論中守門人的概念，首先來自李溫(K. Lewin)，四十年代他研究主婦選購家用食品，發現了守門人這個角色。真正做新聞事業守門人研究的首推懷特，(White,1950)他以電訊編輯為受訪對象，找出他們的守門行為。但在早期傳播研究中，守門人研究成果不豐。1964年吉伯(W. Gieber)再進行了一次守門人調查，發現個人價值判斷並非重要因素，重要的是來自組織的種種壓力。這以後乃掀起了一些組織與守門人關係的研究。不過早在1955年，美國社會學家布里德(Breed,1995)那篇重要報告「新聞室的社會控制」發表後，大大充實了守門人理論。

因此，在守門人理論中說明了守門行為，來自兩類影響因素，一是主觀的因素，如個人教育背景、意識形態、新聞價值觀，乃至人口與人格因素。另一類則來自客觀環境，與組織的種種壓力，以致影響到一個新聞編輯的審稿能耐。(McQuail,1994:213)

由於新事物擴散理論 (diffusion of innovation)對不同人與社會體系分析較具體，於是我們再以新事物擴散理論中社會體系、意見領袖，或改變策動者的特性，以解釋副刊守門人所需要的特質。這個社會體系可以是一個人、一個團體，或是一個分支體系，體系中總有一些人屬於群體的前端，包括意見領袖與改變策動者。他們的角色極似副刊編輯，當社會傾向改變時，他們樂於提供新知、新觀念，當社會趨於保守時，他們也可能依循規範，對新事物採取保留態度。

意見領袖與改變策動者的特質包括：1.經常接觸外來的傳播內容；2.萬國性較高；3.有較高的社會地位；4.有較高的創新性。(Rogers,1983:28)證諸我們的副刊編輯，若能從事更深、縝密的調查研究，應該可以得到類似的發現。也就是說，副刊主編應較一般守門人，具有與眾不同的氣質與秉賦。

陸、摘要與結論

本研究旨在依據少數實證研究資料，找出報紙副刊內容的傳統。儘管報禁開放後，每一家報紙副刊的種類何止六、七個之多，然我們以名為「副刊」的，或報紙主要副刊，為了解對象，結果發現副刊內容有四個重要涵義，他們是：

- 1.副刊內容隨時代變遷，而有不同的導向；

2. 儘管內容不斷變遷，副刊仍以文學、文藝為主要內容；
3. 副刊第二受到重視的內容，即評論文字與消息報導；
4. 副刊內容導向與風格之建立，副刊主編是一個主要因素。

我們用新聞學理來解讀這四項內容傳統，發現解釋能力頗強，建議能力也值得重視。九項新聞學理，都可以應用到副刊內容建構上來，其大要略為：

1. 媒介體制深受一國政經制度的影響，也直接反映到副刊內容的變化；
2. 媒介霸權理論或文化霸權理論，隨著政經意識形態，伸入副刊內容，使副刊也成為當時社會整合的工具之一；
3. 現代閱聽人所以閱讀副刊，是他們覺得副刊對他們有用，最終可以滿足他們關懷社會、關心世界的需要；
4. 閱讀副刊也象徵著閱聽人一種社會期待的來源；
5.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為免產生知識差距的效果，副刊的體裁、內容，其難度不應經常維持在某一程度之上，否則曲高和寡，必導致讀者的疏離；
6. 媒介議題極可能成為社會議題，副刊內新聞評述之議題設定過程中，副刊主編宜慎重選擇議題；
7. 就新聞評論而言，沉默的螺旋理論告訴我們，副刊主編在邀稿或選稿時，除了注意大眾共同的意見，也勿忘發掘少數人的意見，那或許正是真理之所在；
8. 守門人理論益顯副刊主編的重要角色，他的重要性甚至超過一般守門人；
9. 守門人的素養，至少得像新事物擴散理論裡的意見領袖，或改變策動者，有較高創新性、較高的社經地位、經常保持與傳播媒介廣泛的接觸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本研究寫作過程中，許多事實有待釐清，卻因時間、資料所限，一時難獲答案，故乃有如下建議，以寄望於未來之研究者：

1. 儘管報紙在任何時候，深受當時環境的影響，特別是八十年代以前，台灣的副刊編輯們，或者說是報紙內的文人，是否必然為當權者馬前卒，需要仔細的發掘與研究。台灣在那個年代，有哪些副刊主編與當政者渾然一體，哪些人抗拒不受，或則啞然中立，都需要清楚的答案，否則一窩蜂泛政治化，或籠統稱之為「政治霸權」掌控一切，個人認為都不是真實

的。

2.各項資料顯示，當前報紙及副刊的訂閱率、閱讀率不斷下降，其原因真正為何，有待進一步縝密的研究。特別是副刊，是因為主編們執著於文藝文學的內容傳統？還是因為他遠離了大眾？或者確實是電子媒介競爭下必然的現象？有了答案，經營者才知道對症下藥。

3.如本研究前面提過，時間進入七十年代，報紙副刊方向逐漸多元化，於是有所謂「新聞的」、「文化的」、「社會的」、或是「綜合的」副刊出現。有人認為，這等於宣佈了副刊的死刑。本研究覺得，需要讀者的研究，以了解改變路線，擴張路線，而不一定是文學的、文藝的路線，是否真正符合讀者的願望。假如答案是肯定的，個人不以為那是副刊之死，而是副刊活水源頭。

4.前章已述及，副刊主編，較一般新聞編輯更具決定性守門職責，副刊風格由此而形塑。也就是說，副刊編輯應比一般編輯有更多的、具體的人格特質與素養。相應於副刊讀者，極似中國文人、士人、或知識份子的特質，那麼副刊主編，究竟需要哪些特質，可能必須從副刊讀者，與副刊編輯研究中，獲得確切答案。

本研究由於資料欠缺，所描述的概況略嫌粗陋，這也益發顯示我們需要更多的副刊研究；特別是有關副刊內容分析，副刊主編心態與人格研究，副刊與報老闆及報社組織關係研究，副刊讀者、作者群的研究，及其與編者之間互動的分析。我們如果有了這些不同研究成果，一方面可以將副刊理論強化，一方面更可預測、控制副刊的傳播效果。

本研究的導向乃屬拋磚之舉，理論固可解釋已有的現象，預測、控制未來走向，更重要他可高懸理想的明燈，讓我們不必低頭摸索，循著他的指引，就可向前邁進。

參考資料

- 尹雪曼 民 81 「論我國報紙副刊的變調」上、下 《國魂》 頁 76-78 頁 82-83
王洪鈞 民 80 「中國新聞事業發展概述」 《中華民國新聞年鑑》(中國新聞學會版) 頁 3-8
任熙雍 民 60 「十年來報業的發展」 《中華民國新聞年鑑》 頁 51-59
向陽 民 82 「副刊學的理論建構基礎」 《文學現象卷》 2:557-596
自立晚報報史小組 民 76 《自立晚報 40 年》 台北：自立晚報
亞弦 民 69 「當前副刊的困境與突破」 《報學》 6:4 頁 13

副刊內容傳統與新聞理論的解釋能力

- 林海音 民 71 《藝窗夜談》 台北：純文學出版社 頁 288
- 林耀德 民 82 「『鳥瞰』文學副刊」《文學現象卷》 2:525-556
- 金恆煥 民 74 「副刊的社會參與」《文訊》 21:122-127
- 徐佳士、楊孝嶸、潘家慶 民 64 《台灣地區民眾傳播行為研究(1974)》 國科會研究報告
- 秦賢次 民 74 「中國報紙副刊的起源與發展」《文訊》 21:42-57
- 翁秀琪 民 81 《大眾傳播理論與實證》 台北：三民書局
- 張錦郎 民 74 「有關報紙副刊的評論分類索引」《文訊》 21:176-186
- 荻宜 民 81 「變革的副刊」《文訊》 8:17-20
- 許瑩月 民 81 《從台灣報紙副刊探索現代中國知識份子的文化關懷及其困境》 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秉璋、陳信木 民 77 《邁向現代化》 台北：桂冠
- 焦桐 民 75 「票房副刊？票房作家？」《文訊》 22:67-73
- 馮放民 民 43 《副刊學概論》 台北：中國新聞函授學校
- 楊仁烽 民 85 「報業的未來」 政大：新聞理論與實務座談會
- 漆敬堯 民 70 「十年來報業發展」《中華民國新聞年鑑》 頁 49-52
- 趙衛民 民 74 「依據理性標準編副刊」《文訊》 21:128-130
- 潘家慶 民 64 「報紙副刊的功能分析」《政大學報》 31:185-212
- 潘家慶 民 73 「報紙副刊應該更上層樓」《新聞媒介・社會責任》 頁 153-158
- 潘家慶、王石番、謝瀛春 民 75 《台灣地區民眾傳播行為研究(1986)》 國科會研究報告
- 潘家慶、王石番、謝瀛春、鄭自隆 民 84 《台灣地區民眾傳播行為研究(1993)》 國科會研究報告
- 編輯室 民 75 「各報副刊歷任主編名錄」《文訊》 22:89-104
- 鄭瑞城 民 77 《透視傳播媒介》 台北：經濟與生活出版公司
- 鄭興東、沈史明、陳仁風、包慧 1988 《報紙編輯學》 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
- 賴光臨 民 80 「檢驗七十年代報業的發展」《中華民國新聞年鑑》 頁 63-64
- 賴光臨 民 81 「報紙副刊將更見重要」《文訊》 8:11-12
- 隱地 民 81 「副刊二題」《文訊》 8:15-16
- Blumler, J. C. & E. Katz, (eds.) 1974 The Uses of Mass Communications. Beverly Hills: Sage.
- Blumler, J. G., 1979 "The Role of Theory in Uses and Gratification Studies," i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6:9-36
- Breed, W., 1995 "Social Control in the News Room," Social Forces 33:323-325
- DeFleur, M. & S. Ball-Rokeach, 1989 Theories of Mass Communication. N. Y.: Longman.
- Gieber, W., 1964 "News is What Newspapermen Make it," in Dexter & White (eds.) People, Society and Mass Communication. N. Y.: Free Press. pp.173-182.
- McCombs, M. E. & D. Shaw, 1972 "The Agenda Setting Function of Mass Media," in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36:176-187.
- McQuail, D., 1994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Noelle-Neumann, E., 1974 "The Spiral of Silence: A Theory of Public Opinion," i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4:43-51.

- Rogers, E. M. & F. Shoemaker, 1971 Communication of Innovation. N. Y.: Free Press.
- Rogers, E. M., 1976 "New Perspectives on Communic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Communication and Development. Beverly Hills: Sage.p.9.
- Rogers, E. M., 1983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N. Y.: Free Press.
- Tichenor, P. J., G. A. Donohue & C. N. Olien, 1970 "Mass Media Flow and Differential Growth in Knowledge," in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34:159-170
- Winter, J. P., 1981 "Contingent Conditions in the Agenda-Setting Process," in Mass Communication Yearbook 2:235-243.